

周佳榮 著

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

周佳榮著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

作者：周佳榮

出版：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

香港九龍太子道西150號
太子商業大廈1303室
電話：3-814204 814205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12.00

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版

序

《蘇報》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的報刊之一，「蘇報案」更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二者對於晚清政治思潮的趨演，都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向來有關的著作，大抵能就《蘇報》的歷史、言論以及「蘇報案」發生的經過，作概略性的陳述。不過，很多史事仍然有待確切的考証，而《蘇報》的歷史地位，也未曾得到較為全面的評價。近年來，由於大量史料的公開、整理和多種報刊的重印發行，使學界對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問題，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就《蘇報》而言，雖然當年的報紙多已散佚，現時難得一見，但坊間有兩種影印本，保存了最後半年的資料，《蘇報》的重要性，正在這半年之間；同時，有關的檔案多已整理就緒，當事人也發表了他們的回憶文字。本書便是基於這些條件而寫成的，通過史料的排比和綜合，改正前人著述中未盡確實的記載，闡明《蘇報》從主張維新、保皇、立憲轉變為鼓吹革命排滿的因由，分析報上的激烈言論以至最後釀成巨案的始末，並以之為線索，探討「蘇報案」前後中國思想界的情形。學界一向注重《蘇報》與早期革命運動的關係，而多少忽略了它在思想轉型期中所起的多方面的作用，實欠周詳，內文曾加以論述，書名《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不作《蘇報與清末革命思潮》，用意亦在於此。

本書資料的搜集，始於一九七三年夏，正式執筆寫作，則在一九七六年間。初時原是向日本廣島大學研究院提出的碩士論文中文原稿，由橫山英教授、今永清二教授、寺地遵先生及楊啓樵先生審閱通過。一九七七年筆者返港以後，再就原稿略予增刪，而成現在的樣子。撰寫期間，廣島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諸師長及前輩多方關懷，富山大學中村哲夫先生和多位友好分別從各地代複印有關資料；付梓之前，香港中文大學陳荆和教授、劉殿爵教授費神關注，藝術系李潤桓先生為封面題字，使本書增色不少；還有王德昭教授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啟迪等等，都是筆者所銘記的。藉着本書出版的機會，謹致以衷心的謝意。



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蘇報》



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蘇報》

日 月 五 期 一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分 售

總發行所●上海英租界三馬路中

蘇報

俄事警聞

發行所 機盤街申市

英租界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九月十五號

大字 第二表

每號錢二十文
日歷明治三十六年
外埠價目

每日一書連載全年六元八角
七日一書連載全年六元
西洋加價

郵政不準應付有審費

告白刊例

第一回文字取錄西文類二日至第七回每字

取錄三文第八日以後每字取錄二文對面告
白照我報加倍論字論面額及行告白二百

字起碼每卷以五十字起碼多則以十字
起碼

單加

光緒二十九年(1903)《蘇報》版頭

國民日報

Published by A. Gossell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a National General Co., No. 1 Kiang-nan Road.

警鐘日報

《蘇報》的後繼者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清末的政論報刊與政治思潮-----	1
第二章 蘇報的歷史及言論轉變的經過-----	9
第三章 學潮興起與蘇報的關係-----	19
第四章 上海的政治風潮與蘇報的革命化-----	29
第五章 蘇報的激烈言論及排滿革命主張-----	39
第六章 蘇報對保皇立憲派人士的駁擊-----	48
第七章 蘇報案的發生經過和結果-----	56
第八章 蘇報及蘇報案的影響-----	72
第九章 結論——蘇報在清末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81
附錄一：關於蘇報案的論爭-----	85
附錄二：蘇報關係簡略年表-----	88
附錄三：光緒二十九年（1903）蘇報論說目錄-----	91
參考文獻-----	98

第一章 緒論——清末的政論報刊與政治思潮

清末政治思潮的開展及演變，與政論報刊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政論報刊之目的與功能，在於造成輿論，藉輿論以推動政治變革。在辛亥革命（1911）前十年間的政治運動中，政論報刊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既促使變法維新要求的高漲，又助長革命排滿勢力的伸張，而新舊思想的衝突以至革命派與君憲派的對抗形勢，也不能不說是隨着報刊言論的激盪而深化。

一般來說，報紙主要是刊登新聞，而雜誌則揭載評論，且材料的選擇，報紙是一般性的，雜誌是比較特殊的。^①但中國早期的報紙和雜誌，無論內容、形式以及對於社會的作用，都有許多相似之處，沒有明確的區分，所以統稱為「報」或「報刊」。所謂「政論報刊」的主要特點，顧名思義，是以議論政治為主，因此「論說」一欄最受重視，而新聞報導反居於次要地位，這與商業性質的報紙和以後進入企業化時代的報紙，是頗不相同的。^②近代中國最早具有政論性質的報刊，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間維新人士先後在北京和上海創辦的《中外紀聞》（又名《中外公報》）及《強學報》，雖然出版未幾即停辦，但已肇人民公開發表政見之先河。在此以前，除「官報」之外，極大多數的華文報刊，都是僑居中國的歐美人士於發行外文報刊之餘而創設的，由中國人自辦的寥寥無幾；且社會上閱報風氣未開，報紙的地位並不受到重視，要到中日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1894）後，「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藉報紙以發抒其意見。」^③政論報刊遂應運而生，很快便成為知識人士吸收同志、鼓吹主張的重要工具，不但造就了中國報業的發展，更開創了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嶄新的局面。

光緒二十二年（1896）間，汪康年、黃遵憲、梁啟超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旬刊，作為維新派的言論機關，其內容「率以變法圖強為宗旨，蓋至是而吾國始有論政之雜誌。」^④出版以後，風行一時，備受各地新學士子的歡迎，「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⑤澳門《知新報》（初時是五日刊，後

改為旬刊)及長沙《湘學新報》(旬刊，後改稱《湘學報》)等繼起，互相應和，匯成了戊戌維新(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熱潮。^⑥維新人士之所以如此着意於開辦報館，乃因他們認定「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⑦而「欲開〔學〕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⑧《時務報》創始，即已宣稱「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⑨嚴復、夏曾佑等後一年在天津發行的《國聞報》(日報)，亦謂其目的「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⑩他們既領會到報刊的力量，因此利用報刊作為宣揚其主義的媒介，遂不遺餘力，辦報一事也就無形中成了維新人士活動的樞紐。及至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先後主編《清議報》(旬刊)與《新民叢報》(半月刊)於橫濱，繼續從事文字鼓吹工作。癸卯(光緒二十九年，1903)間，上海的革命派刊物《國民日日報》至於以《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三份雜誌為代表，劃分戊戌前後國民思想精神變化的進程為變法、保皇及立憲三個時期。^⑪事實顯示，這些雜誌曾經成為社會潮流的啟蒙及主導力量，使新思想、新知識得以較普遍地傳播，擴大了知識人士的眼界，並加強了他們的國民觀念和變革熱望，所以不失為反映時代趨向的代表性刊物。

如上所述，最初的政論性報刊，都是維新派人士所創辦的。至於早期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的志士如孫中山等，由於偏重實際行動，忽略了文字方面的鼓吹，且興中會於甲午(光緒二十年，1894)成立之初，文人墨士頗為缺乏，所用的宣傳冊子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選錄《明夷待訪錄》內《原君》、《原臣》二篇而已，尚未建立正式的言論機關。^⑫自從乙未(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一役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規劃革命，重圖大舉，漸知創設宣傳機構為革命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項工作，乃於己亥(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派遣陳少白至香港發行《中國日報》，由是始有革命報紙面世。^⑬

革命思想亦萌興於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之間，早在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之際，留學界已有傾向革命的言論出現，是值得注意的一事，因為中國國內早期革命思想的胚胎，多少乃承接此脈絡而來。當時留學生不滿百人，

但「人人皆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學說」，「而主張根本改革之激烈論者，殆過半數。」是年留學界開始發行《譯書彙編》月刊，專以編譯歐、美法政名著為宗旨，如盧騷《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約翰穆勒《自由原論》、斯賓塞《代議政體》等，逐期刊登。隨着又有《開智錄》半月刊的出版，專發揮自由平等學說。這兩種雜誌對於啟迪知識青年的思想，都有相當的功勞。秦力山、戢元丞等復於辛丑（光緒二十七年，1901）發起《國民報》月刊，鼓吹民族主義，措辭頗為激烈，開留學界革命報刊之先河，但因經費不足，出版僅數月，即告停刊。次年年底，戢元丞繼辦《大陸報》月刊於上海，倡議改革，排斥保皇，可以說是上海最早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刊物。^⑭

可是，在當時國內外的環境下，革命言論的展開，殊不容易。戊戌前，「所謂士大夫讀書階級，差不多完全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派的地盤基礎；」^⑮變法雖然失敗，但他們繼而提出的保皇、立憲主張，在思想界中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且，革命人士初時所依靠的，主要是海外華僑社會及會黨勢力，在國內幾乎沒有得到甚麼大的支持；康有為在加拿大組織了保皇會（光緒二十五年，1899）後，在海外聲勢大增，更奪去了不少革命的據點。「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⑯留學界的現象，僅為革命事業透露了一點曙光，要把革命思想向國內灌輸，實是一項艱困的工作。

上海是中國沿海中部的一個大城市，又是重要的交通孔道，鴉片戰爭（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1840—42）後，闢為通商口岸，英、法且相繼設立租界於此。由於地理環境及華洋雜處的緣故，上海也就很快成為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一大集合點，具有較特殊的社會形態。開埠不久，外僑因鑒於商業貿易的需要，很早已有外文報紙的創辦，後來更因他們與華人的商業關係日漸密切，所以又經營起華文報紙來，同治十一年（1872）創刊的《申報》和光緒十九年（1893）創刊的《新聞報》均為日報中的重要代表。這些報紙的內容，初時都偏重於報導有關貿易事情及宣傳商品，不但沒有中心的主張，也不敢涉及政治問題，祇是當作與華人貿易的一種工具而已。^⑰甲午以後，

中國人自辦的報刊大量出現，使上海頓成全國出版事業最蓬勃的地方。是時具有開創一時代風氣意義的刊物，應首推《時務報》，已如前述。但該雜誌因汪、梁二氏交惡及戊戌年六月（1898年7月）清廷下詔改為《時務官報》而告終，汪康年另設《昌言報》，其體例皆仍《時務報》之舊，政變發生後，旋即停刊。而早在是年閏三月（5月）間，汪氏還另外發行了一種《時務日報》，以記載中外大事、評議時政得失為主，銳意革新，圖與《申報》競爭，隨後改名為《中外日報》，政變以後仍繼續出版，成為上海主要的日報之一，其言論由始至終，大抵不出變法維新的範疇。^⑯此外，庚子間，日人田野橘次創《同文滬報》（日報），鼓吹改革，與唐才常在上海組織正氣會（自立會）及召集維新志士，頗有密切關係。^⑰總言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上海的幾份主要日報，如《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及《同文滬報》等，都不是革命報紙，甚至對革命活動予以嚴厲的抨擊，可見當時比較開明進步的上海言論界仍是頗為保守的，更遑論國內其他地方了。

不過，知識人士對國事的關心日益普遍，實為革命造成一種新的形勢。他們由於受了戊戌維新失敗及庚子義和團事件的刺激，痛感滿清政府腐敗無能，開始羣趨於救國的政治運動，「而革命風潮從此萌芽矣。」^⑲維新以後京師與各省學堂的設立，和庚子以後出洋留學風氣的盛行，更使知識人士有了集中一地的機會，在新知識、新思想的激盪下，逐漸形成了一個具有覺悟性的新知識羣。^⑳他們富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及民族意識，對於國家處境與政治形勢的反應極度敏感，思想和言論均十分急進，因此對於舊社會的不滿情緒以及希求變革的欲望，也最為明顯易見。壬寅、癸卯（光緒二十八、九年，1902、03）之際，國內外學潮的風起雲湧，實反映了這一新知識羣體的興起及擴展。學潮的出現，肇始於留日學生界。因為庚子以後變法的要求益切，而所有新政又需人辦理，地方政府遂相率有留學生的派遣，其中以前赴日本的居多，光緒二十八年（1902）留日學生已有六百餘人，次年即驟增至一千三百餘人。^㉑這兩年間，先後有「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發起，「成城學校入學事件」（東京留學生反對清使館拒絕保送私費陸軍學生事件）的發生，及「拒俄學生軍」的組織等等。在國內，學潮也日益澎湃，首先是

上海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在張園舉辦「協助亞東遊學會」，不久，南洋公學、南京陸師學堂等相繼發生退學事件，而類似的情況，更遍及全國各地。同時，國內外的知識青年，又藉着出版書報和各種機會，互為呼應，聲勢日益浩大，正如孫中山所說：「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而演成革命風潮初盛的時代。²³

其實這些愛國的新知識分子，起初他們的思想並不是革命的。例如留學界最先的進步刊物《譯書彙編》及《開智錄》「都還沒有提出革命的或其他的激烈主張，同改良主義者的政治分野實際上還不明顯；」事實上《開智錄》創辦人之一的鄭貫一，是《清議報》的助理編輯，因此言論雖然緩急有差，但仍不是革命與改良之別。到《國民報》出現，才「反映了新從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愛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面貌」，雖未正面地提出反滿革命的主張，卻認為革命黨人所抱的顛覆自命的宗旨是既美且正，可見已有了強烈的革命傾向。此外，留日學生在癸卯年創辦的幾種帶有地方色彩的月刊，如《湖北學生界》、《浙江潮》和《江蘇》等，都着力於介紹世界局勢及指出中國危機，企圖藉着輸入外國新知，催促國人發奮圖存；換言之，是從愛家鄉、愛祖國的熱情出發，初時並沒有宣傳排滿和革命。²⁴

雖然如此，新知識羣急激地趨向革命，且成為清季革命勢力中重要的一環，則是明顯的事實。論者至以為，在辛亥革命中，會黨分子、商人、華僑等雖擔任了角色，但主要的推動力實來自學界；²⁵或更清楚地指出，學界中的革命知識分子集結在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主導思想之下，領導革命活動，最後推翻了滿清政府的統治。²⁶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多置其重點於急進知識分子跟革命運動之間的關係，²⁷而多少忽略了新知識羣整體性推移的情況，以及這一羣體在趨向革命的過程中所表現的形態等等。這些問題，將在下文中通過具體的事實引證，予以較詳細的申論。此處仍需指出，新知識羣與政論報刊二者息息相關及互為因果的現象，亦頗可注意，理由是新知識羣一面既受了進步書報的影響而加速成長的腳步，同時他們又發行更多新的刊物，以鞏固和擴大其社會基礎。

總括來說，庚子至壬寅（1900—02）的幾年間，中國的革新勢力大體上

仍為康、梁的論調所左右，但一個傾向革命的新知識分子羣體正在醞釀形成，不過尚未正式揭起革命的旗號。而唯一聲稱革命言論機關的《中國日報》，「初以不審英人對華政策所在，一時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滿之說，半載後措辭始漸激烈；」^{②8}又「因操筆政者，短於歐美新思想，頗不為學者所重視。」^{②9}在早期的革命運動中，事實上並未能有效地負起鼓吹革命思想的任務。結果，癸卯（1903）年間，在上海異軍突起的一家革命報紙，竟是並非由革命人士所籌辦的《蘇報》（日報），其言論至為激烈，震驚朝野，隨後由於清政府的壓制，釀成了舉國矚目的「蘇報案」。自此江浙一帶的政治風氣，有了很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蘇報》清楚劃分了革命與改良的思想界線，並配合着時局的發展，催促了知識人士急劇地向革命轉化，使革命形勢，頓為改觀。

而且，《蘇報》的主張，前後迥異，「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草蛇灰線，層級井然。」^{③0}其轉變的經過，充分反映出晚清政治思想的演化和趨向。下文即以《蘇報》為主要線索，探討癸卯前後中國思想界的情形，分析《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發展的關係，並進一步對於這份報紙的歷史地位，給予全面性的評價。

註釋

- ① 參閱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五。
- ② 參閱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上冊，頁一九一至一九三。
- ③ 同註①，頁一七六至一七七。
- ④ 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卷二，頁一二上。
- ⑤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清議報》第一百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頁四下。
- ⑥ 參閱湯志鈞《戊戌變法時的學會和報刊》，氏著《戊戌變法史論叢》頁一四九至二五〇。
- ⑦ 梁啟超《變法通議》之十三、論學會，《時務報》第十冊，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1896年11月5日），頁二下。
- ⑧ 梁啟超《與穗卿足下書》，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引自丁文江編《梁

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二五。

- ⑨ 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時務報》第一冊，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頁一上。
- ⑩ 《國聞報緣起》，見《中國報學史》頁一四五附註。
- ⑪ 《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三集「社說」，頁三一至三七。
- ⑫ 參閱馮自由《革命初期之宣傳品》，氏著《革命逸史》第一集，頁一七。
- ⑬ 參閱馮自由《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革命逸史》第一集，頁九八。
- ⑭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五四至五五；並參馮自由《橫濱開智錄》、《東京國民報》、《東京國民報補述》及《勵志會與譯書彙編》，《革命逸史》第一集，頁一四二至一四七。
- ⑮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頁二〇八。
- ⑯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國父全書》頁三四。
- ⑰ 參閱胡道靜《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二卷第三期，頁九四七至九四八。
- ⑱ 同註①，頁一二三、一四〇；註⑥，頁二五四至二五五。
- ⑲ 參閱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六七至六九。
- ⑳ 同註⑯。
- ㉑ 參閱王德昭《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一期，頁一一一至一一三。陳慶華《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知識分子》稱這個新知識羣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認為他們「是中國歷史發展到十九世紀末尾和二十世紀開頭年代的新產物。」（見《光明日報·史學雙周刊》第二二二號，1961年10月11日。）亦參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四〇至五七。
- ㉒ 參閱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頁四六；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八四。
- ㉓ 同註⑯。
- ㉔ 參閱胡繼武、金沖及《同盟會成立前留日學生中革命思想的發展》，《光明日報·史學雙周刊》第一七四號，1960年11月26日。

- ㉕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p. 227.
- ㉖ 同註㉑，頁一一九至一二五。
- ㉗ 如 Mary Backus Rankin 前引書（註㉕）及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 ㉘ 同註㉓。
- ㉙ 同註㉑。
- ㉚ 《蘇報案紀事》頁一。

第二章 蘇報的歷史及言論轉變的經過

《蘇報》初時「本一營業性質之小報」^①，在上海的新聞界中沒有甚麼地位，^②其早期歷史，世人所知甚少，有關的記載多屬互相轉引，且說法亦不盡相同。由於缺乏詳確足供參考的文獻，實難以作深入的考證；不過，把現存的資料加以比較和分析，尙能找出大致的脈絡及糾正若干的錯誤。

關於《蘇報》創刊的年份，有兩種記載，一說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③一說是次年夏季，^④向來學者都是任採其一，未予肯定孰是孰非。^⑤早期的《蘇報》經已散佚，無從用實物證明，然而，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1903年5月6日）《蘇報》報端印有「第二四五一號」字樣，以後逐日順次編號，據此向前推算，如果中間沒有停刊過的話，《蘇報》應創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六、七月左右；若曾經中斷，則最初發行的日期還要更早。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書首加插《蘇報》圖版一張，上面印有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1898年2月5日）及「第五七六號」字樣，進一步證明了這個推算結果的可靠性。無論如何，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創刊的說法是不對的。

《蘇報案紀事》應是最早記述《蘇報》歷史的著作，可是該書祇簡單地說《蘇報》「向為日本人所創辦」^⑥，交代得頗不清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始記載該報是「胡璋（鐵梅）所經營，但由其妻日本女子生駒悅出名，在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註冊。」^⑦再從其他資料，得知當初的主筆是鄒弢。^⑧光緒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間，鄒弢向英租界公廨控告館主生駒悅強迫撰稿索賄，生駒悅曾向鄒弢說：「館由東洋外部大臣來的，領事亦不能管我。我雖平常人，曾由胡鐵梅在日紳日官前保舉為館主。」^⑨因此，《蘇報》更被認為是日本政府外務省（外交部）在上海所設立的機關報。^⑩但生駒悅這段話出於與人訴訟之時，是否全屬事實或有誇大成分，現已無從確定，日本方面也不見有相關的記錄，^⑪所以，祇可以說早期《蘇報》在人事上或經

濟上與上海的日本人有若干關係，光緒二十九年四月九日（1903年5月5日）以前，該報兼用日本明治紀年，亦足為一佐證。由於上述原因，「故外稱日人所設，」¹²但必不至於是日本政府的機關刊物。

《蘇報》「在這樣姿態下經營着，內容卻不十分的好。」¹³「所刊消息議論，頗為無聊。」光緒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間，曾因刊登黃色新聞與法租界公廨發生糾葛；次年又有前述主筆與館主訴訟之事，可見名譽也很差。加以經營不善，頗有虧蝕，遂全盤出讓，由一個叫做陳範的舉人購得，繼續營業。¹⁴陳範原名彝範，字夢坡，湖南衡山人，本為江西鉛山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¹⁵其兄陳鼎則因戊戌黨事獲罪，被判永久監禁。¹⁶陳範由是「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遂承辦是報。」¹⁷以其妹婿汪文溥（蘭皋）助理報務。¹⁸館址初在英租界四馬路望平街，後遷至棋盤街，最後則設在英租界三馬路二十號。¹⁹據汪文溥回憶說：

丁戊〔光緒二十三、四年，1897、8〕之際，康有為始以維新號召徒黨，君〔按：指陳範〕私謂余曰：「中國在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餉國人，俾無再入迷途。」於是相與在滬組織一日報，此即壬寅〔按：應為癸卯〕以言革命被禍之《蘇報》也。²⁰陳範如何認為康有為持論不當，已無從得知；但他承辦《蘇報》的原因，是希望藉着文字宣傳來挽救國家危墮的局面，則是很明顯的，當時比較開明的官僚和知識人士心目中救國的方法，大抵不外如是。因為這個緣故，《蘇報》便開始成為一家具有政論性質的報紙了。

至於陳範接辦《蘇報》究竟於何時，說法並不一致。後人著作，有說是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²¹但多數說是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²²較為可信的資料有二：一是《蘇報案紀事》，該書是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1903年7月）「蘇報案」發生後在同年內出版的，提及陳範接辦一事，謂「至今將及四年，」²³換言之，應始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間；另一是汪文溥的回憶文字，說陳範和他接手《蘇報》，「適在戊戌政變。」²⁴按政變發生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1898年9月下旬），結合上兩資料來看，《蘇報》應於這時或稍後至翌年間轉由陳範主持，當屬不謬。